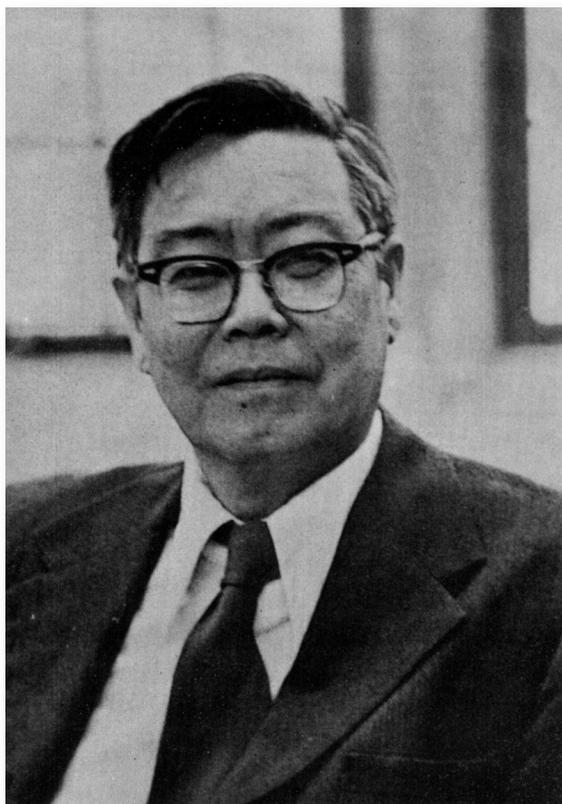


劉子健與近史所創辦者 郭廷以的關係



引自：《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東京：同朋舍，1989）

黃寬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 44 期 2025.6

一、前言

劉子健教授（1919-1993）是第一代旅美宋史學者，其卓越的學術著作影響國際宋史研究，也造就不少宋史英才。他曾經熱心提升臺灣歷史學界的研究與發展，貢獻良多，但因久居美國，留存的文獻資料稀少又分散，以致於目前記述劉的文章裡，若有提及他參與過臺灣學界活動，僅呈現出宋史學界的資訊，其餘方面則模糊不清。^①

筆者偶然翻閱《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以下簡稱《郭廷以日記》）^②，發現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爲了自己備忘，記錄1957年至1967年他個人與近史所發展黃金年代所歷經的重要事蹟，無意間爲後人留下了見證近史所創建初期以及中央研究院遷臺早期學術生態的豐富史料。^③其中1962至1964年是劉子健參與臺灣學術活動最密切的三年，日記記載百餘條劉子健協助郭廷以所長推動中美學術交流、開展近史所學術事業的事蹟。^④筆者因研究本項課題，將這本日記與相關史料仔細交互比對、探索，深感郭撰寫日記主要在記錄自己所歷及觀察意見，非有意公開，供後人閱讀；再核對他親友門生之言論，對郭的學術風骨、自我要求、待人接物等諸多層面均甚敬重，認爲《郭廷以日記》所記內容的可信度相當高，而其內容周詳豐富，所涉及來往的諸多師友、學者、政界等人物暨事件，均具史料價值，值得學界重視。^⑤是以，本文嘗試透過這份日記，勾勒劉子健協助近史所的事蹟，說明他出力協助臺灣的學術發展，除了推動宋史研究貢獻卓著，尚有許多值得發掘的內容。^⑥

- ① 參見 Andrew H. Plaks, Willard J. Peterson, Hai-tao Tang, and Ying-shih Yu, "James T. C. Liu (1919-199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3 (1994): 1044-1045 (<https://doi.org/10.1017/S0021911800032162>); 周明之 (Min-chih Chou), 〈劉子健先生傳略兼論旅美華裔文史專業者的歷程〉,《宋史研究集》第35輯 (臺北: 蘭臺出版社, 2005), 頁485-505; 以及虞云國, 〈劉子健的學術生涯與故國情懷〉,《商丘師範學院學報》37.11 (2021): 92-99。
- ② 郭廷以著, 陸寶千、張朋園、魏秀梅點校,《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這本日記首尾不全, 中間斷缺, 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自1950年4月1日至同年10月18日止, 第二部分起於1957年11月11日, 迄至1967年7月31日。
- ③ 陸寶千說:「郭師生前, 每日自書言行, 乃是爲了備忘而非供他人閱讀, 故很多文句, 字跡潦草, 別人不能辨認。」見陸寶千, 〈前言〉,《郭廷以日記》, 頁iii。
- ④ 日記所述難免有簡有繁, 有些事情若缺乏佐證資料, 難以具體掌握人事背景及脈絡, 不易作完整論述。筆者試著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及書信等資料, 從若干側面加以補充或推測。
- ⑤ 這本日記於郭辭世37年後(2012年)才出版, 臺灣學界尚未充分留意到它的重要性。就個人所見, 目前約有10篇論文使用這本日記產出研究成果, 其中臺灣僅陳三井教授, 而中國大陸學者楊金華、李亦冉, 則大量採用這本日記及書信檔案撰述論文。陳三井, 〈郭廷以首次赴美學術之旅見聞〉,《傳記文學》121.3 (2022): 36-47。楊金華, 〈正本清源: 郭廷以與「胡適派」學人關係新論〉,《臺灣研究集刊》(廈門) 2019.2: 90-101; 〈追根溯源: 胡適與郭廷以關係新解〉,《傳記文學》114.2 (2019): 42-53; 〈郭廷以晚年緣何赴美未歸〉,《傳記文學》114.6 (2019): 41-57; 〈郭廷以與吳相湘緣何走向對立〉,《傳記文學》116.1 (2020): 49-68; 〈自由史家與在野幕僚: 郭廷以的兩重身分〉,《漢學研究通訊》39.1 (2020): 18-29; 〈一波三折:《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出版始末〉,《傳記文學》123.3 (2023): 30-44; 〈郭廷以與蔣廷黻學術交遊新考〉,《傳記文學》124.2 (2024): 14-28; 〈郭廷以與唐德剛的師生情誼〉,《傳記文學》125.4 (2024): 4-22。李亦冉, 〈「甚矣處人之難」——中研院近史所申請美國福特基金的一段插曲〉,《傳記文學》123.1 (2023): 108-114。
- ⑥ 劉子健對臺灣學術界的貢獻, 最爲人熟知的是協助史丹福大學在臺大成立中國語文研習所(後來擴大爲美國各大學學生來臺學習中文), 以及推動建立宋史座談會的運作機制。筆者預計日後再另文介紹這兩部分。

二、劉郭結識與締交的背景

(一) 近史所的設立及美國研究中國學術風潮

中央研究院於 1955 年 2 月 1 日設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由郭廷以主持。郭廷以青年時期即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1937）、《太平天國史事日誌》（1946）聞名士林，所載要事要言，足備學者查考採輯；遷臺後又持續致力編寫《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他編製的多種《史事日誌》並非單純之編纂整理，而是依年代為序，述史事脈絡，細審比觀彼此之互相影響，是一位治學嚴謹、厚積薄發之學者。⁷

學術機構的建立，與時代環境的關係密切。近史所成立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10 年，是世界冷戰格局脈絡下的環境產物。⁸ 當時正值國民政府在臺灣重建政權的艱困歲月；政治上處於戒嚴時期，白色恐怖像把懸壓在眾人頭上的利刃，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經濟上依賴美援及農業加工品出口，政府經費拮据。此時成立的近史所，旨在培育優秀人才、充實研究經費及圖書設備、加強學術交流，對經費的期待十分殷切。然而國家資源有限，代理院長朱家驊與郭廷以共商發展之道，決定尋求外援，其中美國福特基金會自 1962 至 1971 年總共十載的資助，讓近史所成立後得以循序成長茁壯，厚植研究能量，奠定學術地位。

然而，近史所為什麼能在 1960 年代創所之初，即能獲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乃至讓費正清、韋慕庭等人願意聯合美國各大學贊助近史所執行微縮案及講座案？張朋園教授依據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度藏費正清教授、韋慕庭教授的書信、檔案，並取得紐約福特基金會與近史所往來之函件副本，加上近史所檔案資料以及當年參與者的證詞，廣泛蒐羅一手史料，撰成《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一書（以下簡稱「張書」）。他在書中復原了近史所爭取福特基金會

⁷ 已有多位學者談論過郭廷以的學術貢獻，請恕無法全數列出，在此僅舉下列諸文為例：呂實強，〈序〉，收入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王爾敏，〈漫談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漢學研究通訊》22.3（2003）：36；侯勵英，〈郭廷以的史學及其貢獻〉，收入《史學、時代、世變：郭廷以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42.4（2004）：41-81；王爾敏，〈二十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王爾敏，〈郭廷以先生一手範鑄之近代史南港學風〉，《傳記文學》96.1（2010）：76-83；王爾敏，〈郭廷以之史學〉，《國史研究通訊》1（2011）：127-145；戴海斌，〈一部近代中國的綜合紀錄：論郭廷以《史事日誌》系列寫作〉，《社會科學論壇》2012.9：210-218；劉進，〈郭廷以史學研究綜述〉，《淮北師範大學學報》34.1（2013）：95-98；劉超，〈清華學人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從羅家倫、蔣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費正清〉，《江蘇社會科學》2013.4：202-210；陳三井，〈師經易得，人師難求——追憶郭廷以先生〉，《傳記文學》102.5（2013）：87-91；陳永發，〈從《中國近代史綱》看郭廷以的為人與治學精神〉，收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等等。

⁸ 潘光哲，〈「重思東亞脈絡下的冷戰」專號導言〉，《思與言》57.4（2019）：4。

資助的歷程，討論福特援助的內容以及近史所在外援下的成就，旁及因這筆鉅額資助放在當時臺灣社會的普遍性貧窮，而引發的風波。張書先從美國需要臺灣為學術訓練基地的角度，觀察 1960 年代美國學術界對臺灣政局的態度；再從微觀方面，根據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各自的治學風格和學術史觀，以及三人的人際互動關係，讓一手史料闡述這三位學者共同推動臺美學術合作的貢獻。⁹

美國的漢學研究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承襲了歐洲漢學傳統，由傳教士擔任先鋒研究者。但從美國在亞洲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另一股始於「敵情研究」的中國研究潮流，無論是美國國務院或是民間基金會，陸續投入了大量研究經費。歐洲漢學向來以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為研究核心，美國漢學的發展趨向則轉變成「當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or Chinese Studies）」。

誠如張朋園所言，美國漢學界轉向研究中國近代，其癥結點是中國在 1949 年落入共產黨控制，美國學界急於瞭解這個大變局的原委，欲探索中國大陸政局發展變化的背景與過程，而重要史料多在臺灣。哈佛大學費正清、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兩人，就是這個潮流中的第一批佼佼者。費、韋兩人既熟悉臺灣度藏近代中國史料的重要性，又推崇郭廷以的學養，因此積極推動雙方學術交流。在他們兩位的支持下，美國的研究經費得以挹注臺灣。¹⁰

（二）劉郭初次相遇

依日記的記述，郭廷以是在 1960 年 8 月，才結識剛自匹茲堡大學轉至史丹福大學任職的劉子健。¹¹ 是年 7 月，郭與胡適、錢思亮等人前往西雅圖參加中美文化學術合作會議。會後，郭於 8 月 18 日轉往加州訪問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19 日晚宴時，初次會晤劉子健夫婦，當日即記下對劉「人極明達」的評述。8 月 23 日又記「應吳文津君宴，……劉君對於近史所與美國大學合作意見，頗有可取，認為必須堅定立場，顧全自身利益」。8 月 25 日應劉子健之宴，飯後暢談中美史學界情形，26 日、28

⁹ 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¹⁰ 張朋園表示：1949 年至 1954 年期間，費正清捲入太平洋學會案而遭到麥卡錫主義的打壓，得不到基金會的支持。1955 至 1959 年費陸續獲得各方經費補助，費又在 1959 年被選為美國亞洲學會會長（AAS），他藉著這個契機，開始大力帶動全美的中國研究。因此，費、韋在 1960 年代努力尋覓研究當代中國的資源，造就他們願意盡力扶持近史所的主客觀環境。見張書，頁 59-69。另參：張朋園，〈韋慕庭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漢學研究》10.2（1992）：437, 445。魏思齊（Zbigniew Wesolowski），〈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漢學研究通訊》26.2（2007）：30-40；〈歐洲漢學：精神遺產與未來發展趨勢——初步探索〉，《漢學研究通訊》30.1（2011）：1-12 之 4。魏思齊還指出，為了美國的中國研究，福特基金會自 1959 年至 1970 年花費 2380 萬美元，主要用在六所大學設立專題與多領域的中國課程，見〈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頁 37。

¹¹ 楊金華表示，郭於 1957 年 11 月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與眾多旅美華裔史家晤談，其中曾拜訪「史丹福大學劉子健」。惟《郭廷以日記》記載此次訪美行程，係自 1957/11/11 起程至 1958/08/24 返臺，日記未見郭與劉會面之記載。況且，依劉本人 1964 年提供給史語所的履歷，1957 至 1958 年期間，劉仍任教於匹茲堡大學，1960 年夏季始轉至史丹福大學任教。是以，難以認定郭劉兩人曾於 1957 年會面。楊金華，〈郭廷以與蔣廷黻學術交遊新考〉，頁 19；〈郭廷以與唐德剛的師生情誼〉，頁 8。

日又與劉兩次長談民國史事。29日再與劉、吳二人討論《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出版事宜。從兩人認識伊始，11天內有6次互動，郭記下多次長談內容，並讓劉參與自己努力多年的《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出版事務，顯見他對劉印象深刻、關係友好，已有相當程度的互信。¹²

(三) 劉子健 1962 年兩次短期訪臺

史丹福大學選定在臺北設置中國語文研習所後，派三位代表來臺考察，劉子健是成員之一。¹³ 1962年3月17日，他偕同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勃魯克（E. Howard Brooks）及倪德衛（David S. Nivison）到臺北，19日在教育部招待的宴會上，劉子健見到郭廷以，並轉述史丹福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吳文津關於史事日誌出版的稿費問題。20日劉與倪德衛到南港拜訪中研院，於史語所招待午飯時兩人再度見面。¹⁴

郭、劉相約於3月22日下午，專就《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部分的印刷費用籌措、史丹福大學申請民國史研究補助、史丹福參與福特基金會對近史所之聯絡委員會，以及口述史計畫後續經費等項目，進行為時兩個小時的討論。郭詳細記載談話內容，「子健爽朗熱忱，且有應世之才，彼此談甚快。渠對臺灣學術界內幕，亦知之頗詳」。¹⁵ 經多次討論、交換意見後，郭對劉子健印象極佳，因此4月中旬回覆費正清詢問美國派學者來臺研究近代史的人選中，調整原擬名單，加列劉子健。¹⁶ 郭又商得正在近史所訪問的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的同意，於4月15日致函劉子健，「告以史丹福大學參加聯絡委員會事，韋慕庭表贊成」。¹⁷ 韋慕庭徵詢費正清、劉子健意見後，在離臺前夕，正式邀請郭廷以訪哥大、哈佛和史丹福。¹⁸

劉子健 1962年3月這次來臺，提供郭最具體的協助，是參與史事日誌出版補助一案。除了初次見面為吳文津傳達訊息外，劉返美後，再來信討論史事日誌出版及史丹福大學民國史計畫進展，並表明盼再能來臺。郭回信授權劉與吳文津商酌辦理史事

¹² 《郭廷以日記》1960/08/19至1960/08/29，頁206-209。

¹³ 1962年3月中旬，史丹福大學派遣兩批學者來臺拜訪。第一批是史丹福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代表3名（勃魯克、倪德衛〔又譯尼威森或尼維生〕、劉子健），17日抵臺，負責設置語文研習所業務；第二批是4名史丹福研究所專家（管理問題專家卜乃特、經濟專家羅賓生、教育專家湯姆斯、分析專家麥克士克爾），18日上午抵臺。蔣介石總統於3月21日同時接見這7名學者。見《中央日報》1962.03.18第4版、1962.03.22第4版，以及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總統事略日記51.01-51.03，數位典藏號002-110101-00020-067。

¹⁴ 《郭廷以日記》1962/03/19及1962/03/20，頁313。另，吳文津於1961年起，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第一任館長。

¹⁵ 《郭廷以日記》1962/03/22，頁314。

¹⁶ 《郭廷以日記》1962/04/10及1962/04/11，頁317-318。

¹⁷ 《郭廷以日記》1962/04/15，頁319。按，韋慕庭夫婦訪問近史所約8個月，自1961/09/08起至1962/04/30止，見《郭廷以日記》1961/09/08及1962/04/30，頁273, 322。

¹⁸ 韋慕庭起意邀請郭訪美案，見《郭廷以日記》1962/04/17，頁320；1962/04/26，頁321-322。《郭廷以日記》1962/06/14，頁331，郭收到韋自伊朗來信表示，哈佛大學費正清有意相邀，史丹福大學則以經費困難，不克參加。《郭廷以日記》1962/12/10，頁368，郭收到韋、費正式來信相邀，囑於來春（即1963年）訪美，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哈佛大學停留，約共3個月。

日誌出版之具體事項。¹⁹ 6月11至13日，亞洲協會通知郭，已獲其總會同意補助出版第一、二冊全部經費，並由該會代表袁倫仁面交出版費臺幣十一萬元。²⁰ 劉於9月致函郭時，提及韋慕庭謂已與亞洲協會議定補助出版史事日誌，並探詢郭1963年赴美日期，擬親自接機。²¹

1962年12月下旬，劉子健因處理與臺大磋商史丹福大學語文訓練事宜再度來臺。25日郭參加由董同龢、姚從吾等宴請劉子健的餐會。27日，劉子健到南港與郭廷以談史丹福現代中國史研究計畫，30日「子健來暢談合作事」。次年1月2日劉返美，臨行前與郭再談該校中國現代史研究計畫，擬聯合美國大學，請郭擔任在臺聯繫工作，並勸郭全力扶植青年學人。²²

郭應韋慕庭、費正清邀請，於1963年3月3日啓程訪美，3月8日抵舊金山，次日下午赴史丹福應劉子健晚宴。²³ 此後近史所曾郵寄多種出版品，包括房兆楹所輯清末民初同年錄一冊給劉子健。²⁴

三、啓動劉子健協助郭的契機

從郭的日記所見，1960年初次相遇，劉即對實際事務提供具體意見，1962年劉子健兩次來臺，讓郭廷以對劉的認識更深，因此主動推薦劉來臺作為期一年的訪問。²⁵

劉子健自1963年夏天起至1964年6月30日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一年，²⁶ 恰逢韋慕庭、費正清兩位美國學界巨擘積極推動與中央研究院合

¹⁹ 劉子健建議「史事日誌出版事似尚少具體辦法，主將全書詳分時期，……先行付印一、二冊」後，郭於1962/05/09接獲亞洲協會詢問史事日誌第一冊印刷費估價，而後郭與亞洲協會代表白安楷及蔡增瑞商定出版清季部分，最後確定出版第一冊及第二冊。細節見《郭廷以日記》1962/05/04，頁323；1962/05/09，頁324；1962/05/12，頁325；1962/05/21-22，頁326-327；1962/06/01，頁329。

²⁰ 郭在日記裡表露喜意。1962/06/11：「亞洲協會通知，關於史事日誌第一、二冊出版計畫，已獲其總會同意，即可簽訂協議。此自一可喜之事，三十餘年之精力，至此可告一段落。」1962/06/12：「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一、二冊出版補助費，亞洲協會來信，全部負擔，盼於今年底成書。」1962/06/13：「關於史事日誌出版費用臺幣十一萬元，亦由袁先生面交。」見《郭廷以日記》，頁331。《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部分於1963年出版，郭在〈編者說明〉向包含劉子健在內的多位師友致謝，表示「均永感不忘」，見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編著者自印，1963），第1冊（清季），頁3。

²¹ 《郭廷以日記》1962/09/29，頁353 郭接獲劉函。劉子健，〈致郭廷以信函〉，1962/0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館藏號：069-01-02-154。

²² 《郭廷以日記》1962/12/25及1962/12/27，頁371；1962/12/30，頁372；1963/01/02，頁373。

²³ 《郭廷以日記》1963/03/03、1963/03/08、1963/03/09，頁384-386。按，郭此程自1963/03/03起程，停留墨西哥及美東，返程則於1964/07/30抵臺，見《郭廷以日記》1963/07/30，頁427。

²⁴ 此即《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²⁵ 見註16。

²⁶ 依1964年5月20日劉子健提供給史語所的簡歷及訪問學人登記表，來訪時間欄填寫「1年」，並未記載訪問起啓日。再依《郭廷以日記》1963/08/12 郭閱讀劉子健的著作《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記下「有其看法」

作，爭取臺灣收藏的檔案，並有意協助近史所及史語所培養人才。四個人因緣際會相遇，促發合作，開啓了劉子健扮演溝通者的角色，具體協助郭廷以處理近史所與美國學界的學術交流。郭、劉兩人個性有別，²⁷對於創業初期亟需積極提升研究視野及開展國際關係的近史所而言，劉子健的身分、個性、視野和人際關係，有助於郭克服難關。劉的口才便捷，才智過人，中日英文俱佳，既有舊學底蘊又受美國學術訓練，且所學跨越政治與歷史，視野寬廣，尤重方法和觀點。他曾經親歷東京審判日本戰犯，蒐集充裕資料，僅費兩年即以研究二戰的日本，獲得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並獲母校聘為助理教授，是當時中國現代史研究與教學的新秀。其後興趣轉向宋史，發表多篇論文和專書，在國際宋史研究萌芽時期，深受重視。他兼長中國現代史、宋史研究，受到旅美前輩如洪業、楊聯陞的重視。從現存楊聯陞給胡適、錢穆的信件及詩文中，可以看到楊對劉才學的評價；又因英文論著的出版，早與費正清有交流互動，是當時在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一位相當活躍的青壯學者。只是劉的學術導師不在臺灣，與臺灣政學界的淵源較淺，因此，以他的才學並透過郭廷以的人脈，劉既可貢獻自己的才識，協助近史所的長成，又可實際了解臺灣學術與政治環境，擴展人脈及見識，是利人利己之事。

郭廷以因務實治學，累積了堅實的學術能量，加上受教及共事的羅家倫、蔣廷黻、朱家驊等人，均為跨政學兩界的大老；特別的是，郭與當前政界具深厚影響的蔣經國及其所倚重的李煥等人淵源深厚，可以直接聯繫，是以創所之後，郭得以順利蒐集大量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檔案資料，進而招攬優秀青年學者。但近史所草創初期，研究人員除少數資深學者外，多是郭陸續甄選的優秀本科及碩士，因此，由郭廷以親自訓練他們從整理資料的過程尋找議題，撰寫專書，以提升研究能量。加上中央研究院在偏僻的南港覓地落腳，鄉間生活條件不足，當時薪資不易吸引甘於孤寂專心探研的優秀青年。因此如何爭取資源，讓青年學者安於工作，又能有效訓練他們的學術能力，提升研究所的整體學術能量及能見度，是郭廷以領導近史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郭廷以沒有當代最看重的歐美名校學歷或名銜，英語並不流利；同時，同仁努力累積的成果雖受國際看重，但與長期耕耘傳統漢學領域，掌握龐大學術資源，研究陣容及學術成果享譽國際的史語所、臺大等機構相比，近史所不論是資料、經費和人力均嫌薄弱，亟待扶持。況且近史所雖獲代理院長朱家驊鼎力支持而得以成立，但1958年1月朱家驊下臺，人事更迭；在中央研究院院內人脈不足、政府及研究院財政困窘的情況下，以現有的成果要爭取發展性的新資源，實屬不易。

一語：1963/08/20 與劉夫婦談話；1963/08/27 與劉子健談及中美合作蒐集資料、史丹福大學中國研究、胡佛圖書館工作開展等要事；劉於1964/06/30 離臺。故可回推劉子健訪問史語所起啓時間，應係1963年夏天。見《郭廷以日記》，頁430, 432, 434, 502。

²⁷ 據認識郭、劉兩人的友人門生所知，郭個性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喜也不擅與他人當面解釋、論辯。劉則感情外放，思維敏捷，又熱心助人，故而容易與人來往互動。

前述 1960 年代美國政府及學界為認識中國，正積極開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但礙於中國閉關，無法直接獲取資料，因而急切地轉向臺灣尋求資料並推動與學界合作。此情勢對已培養一批堅實研究團隊，但尚待突破阻礙、爭取資源的郭廷以而言，正是締造理想研究環境的有力外援。中美雙方都深刻體認到彼此需要合作，才能創造雙贏、互蒙其利。

以下三節擬逐一細述劉子健 1963 至 1965 年期間，協助郭廷以推動近史所與美國學術交流的三項具體事蹟：微縮案、講座案以及協助青年學者。張朋園曾經研究過微縮案和講座案，²⁸不過，張書 1997 年出版時，《郭廷以日記》尚未刊布，因此張書敘述劉子健的內容較簡略。如今從日記以及相關書信、檔案，可以仔細看到這兩案發展的轉折，修正張書之若干見解，並補充劉子健在其中扮演的份量。

四、微縮案

隨國民政府遷臺，量多質優的書籍、檔案、文獻，成為美國學界欲取得的研究資源，特別是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對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國民黨及調查局蒐藏的豐富檔案，尤感興趣，亟盼將這些資料攝製成縮微膠捲，以利研究，希望透過郭廷以在臺灣學界與政界的人脈溝通各方，促成此事。

張朋園指出，韋慕庭是透過唐德剛向郭廷以徵詢攝製資料。²⁹不過依 1963 年 5 月 24 日日記，郭在哥大與何廉、唐德剛討論哥大東亞研究計畫及添置中文圖書資料內容看來，是郭先提議設法複製臺灣所藏中共及其他有關文獻的。³⁰5 月 26 日郭從紐約哥大轉到波士頓哈佛大學訪問，6 月 6 日接獲唐德剛的信，說哥大東亞圖書館館長對雙方合作攝製臺灣民國史文獻極感興趣，希望他再去紐約面談。何廉也盼望郭再訪紐約，他遂於 6 月 16 日再回紐約，當晚唐德剛來商量哥大圖書館與近史所合作複製民國史料一事，唐立即起草計畫書，希望次日就請館長批准。郭表示「余與涇廉均主慎重處理，不可操之太急。以臺灣情形頗為微妙，事涉與外人合作，更易授人口實。目前僅可作一原則性之諒解」，次日郭和哥大商談雙方合作蒐集民國文獻的原則，是「哥大任經費，余負責選擇，先行試辦；自司法部調查局資料處收藏開始，具體辦法俟余返臺商定後擬訂續商。每年費用暫定為美金五千元，先付一、二千元。」³¹

²⁸ 張書，頁 41-58。

²⁹ 張書，頁 42：「最早倡議攝製臺灣資料的，似乎是韋慕庭。但他並沒有直接向郭廷以提起，他是透過哥倫比亞大學東方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唐德剛首先試探。……這樣敏感的問題，韋是不便直接啓齒的。……郭的個性沉穩，惜字如金，即使同意也不會立即作答。」

³⁰ 郭接受韋、費邀請，自 1963/03/03 起至 1963/07/30 止在美國訪問。《郭廷以日記》1963/05/24，頁 406：「下午與涇廉、德剛談哥大東亞研究所今後計畫，應側重於民國史。又談哥大中文圖書資料添置事，余主設法複製臺灣所藏中共及其他有關文獻。」

³¹ 《郭廷以日記》1963/05/26 及 1963/06/06，頁 406, 410；1963/06/16-17，頁 413。

郭廷以結束美東訪問後，回到舊金山。7月5日即接唐德剛商量複製文獻的信，唐明示韋慕庭有意大規模在臺攝製史料，顯示哥大計畫範圍更擴大。³²由於雙方討論相當具體，研擬攝製民國初期縮微史料一案，成為郭7月30日返臺後首先要處理的事情。8月8日郭覆函韋慕庭，正式表明等他與有關單位具體接觸後，再奉告各方的意向。³³8月20日唐德剛來信又提到在臺複製文獻計畫，郭決定和有關方面商量，旋得知調查局資料不准外人閱覽，需要實際了解內情；同日郭與劉子健夫婦會面，當已談及此事。

1963年夏季已抵達史語所開始進行為期一年訪問研究的劉子健，在8月27日與郭面談時，便參與雙方磋商攝製縮微史料的實際工作，劉強調「主權須操之在我」。10月17日兩人再商談攝製史料膠片的事，郭於11月又收到唐德剛來信續商攝製存臺史料問題。³⁴

郭廷以12月10日得知韋慕庭將於12月29日來臺，決定先拜訪羅家倫，討論黨史會資料攝製事項，並到臺中實際掌握這批史料的內容。12月23日收到唐德剛函告哥大圖書館館長及韋慕庭對在臺攝製史料有濃厚的興趣。但郭廷以考慮到這批史料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既要與有關方面商量，尤需爭取高層核心的支持，乃聯繫蔣經國。³⁵

1963年12月30日，郭廷以、劉子健陪同韋慕庭一起面見蔣經國。郭記下「韋慕庭提出攝製資料問題，經國表示甚好，主由近史所主持其事，再由中美人士合組委員會策劃進行，態度極為開明」，接著又與羅家倫談黨史會資料。韋於12月31日親赴臺中看黨史會的史料。郭又安排韋於1964年1月1日拜訪白崇禧，讓韋慕庭感到此行收穫豐碩。³⁶張書表示，韋邀請劉子健參與商談微縮案，雙方在語言文字上都很方便，韋「更需要參考劉的意見，拿捏分寸」；並引述劉致韋的原始信函，劉樂意與韋合作，這種合作是專業的（professionally），也是社交的（socially），劉樂意扮演一個穿針引線人。³⁷

本案既獲得蔣經國的支持，雙方即著手擬定辦法。在磋商具體辦法的過程裡，劉子健不僅在韋慕庭、費正清與郭廷以之間聯絡溝通，更對計畫書的內容提供具體意見。張書指出，由於這批資料十分敏感，為保密起見，劉子健常透過臺北美國大使館的郵政系統與美方溝通。³⁸

³² 《郭廷以日記》1963/07/05，頁419。

³³ 《郭廷以日記》1963/08/08，頁429，郭有提到這封信，可惜僅記下一句話：「函韋慕庭，謝在紐約招待，並談口述史計畫。」張書則引述了這封信的內容：「我聽說（I am told）哥大圖書館有意縮微臺灣所藏之民國及中共史料，先生亦同意此說。我將於有所接觸之後，奉聞此間意向。」見張書，頁42-43，註3，“T. Y. Kuo to C. Martin Wilbur, 1963.8.8”。

³⁴ 《郭廷以日記》1963/08/20，頁432；1963/08/27，頁434；1963/10/17，頁444；1963/11/23，頁451。

³⁵ 《郭廷以日記》1963/12/10，頁454；1963/12/14，頁455 郭回函歡迎韋來臺；1963/12/23，頁456。

³⁶ 《郭廷以日記》1963/12/30-31，頁458；1964/01/01，頁459。韋於1964/01/02離臺。

³⁷ 張書，頁43；以及同頁註6，“James Liu to C. Martin Wilbur, 1964.2.7”。

³⁸ 張書，頁43。

從郭廷以的日記中，更可以看到劉子健在推動檔案資料微縮案的過程中，具舉足輕重的角色。劉子健 1964 年 1 月初前往印度參加東方學會，1 月 18 日回臺，自該日起到 4 月 21 日費正清離臺後約三個月期間，是本案發展的關鍵。從日記所見，郭廷以和各方聯繫過程中，劉子健密集參與，並提供意見。這些記載與本案發展至關重要，是補充既有研究不足的寶貴資料，以下逐條列出劉參與的部分。

1964/01/18 至 1964/04/21 《郭廷以日記》所見劉子健事

- [01 月 18 日] 劉子健自印度歸，談到香港晤亞洲協會袁倫仁及李定一等人，稱「亞協可望於出版週轉金有所協助，其他方面恐有困難」。(頁 464)
- [01 月 19 日] 與王信忠、劉子健談，他們「建議不妨短期以客座教授名義去香港」。(頁 464)
- [01 月 21 日] 向王院長「說明中美合作在臺攝製史料商談經過及原則。韋慕庭自紐約來信，續商攝製史料計畫」。(頁 464)
- [01 月 25 日] 「劉子健送來中美研究資料交換計畫意見書，又送來中印學術聯絡建議。」(頁 465)
- [01 月 27 日] 陳榮捷等人到南港，劉子健款待，飯後到近史所參觀。(頁 466)
- [01 月 28 日] 韋慕庭來信「詢史料交換計畫」。(頁 466)
- [01 月 30 日] 「復韋慕庭信，告以中美交換資料計畫書正在修正。」(頁 466)
- [02 月 03 日] 與羅家倫「談中美交換研究資料，黨史會願參加，主分期進行」。(頁 467)
- [02 月 04 日] 「德剛來信，促從速進行中美資料交換事。」(頁 467)
- [02 月 06 日] 「與劉子健商中美互換研究資料辦法草案，大致決定。」(頁 468)
- [02 月 12 日] 李煥來「談中美研究資料交換計畫，並託將草案轉經國一閱。」(頁 469)
- [02 月 18 日] 李煥電告蔣經國支持此計畫，一切由郭主持，「即請其通知司法部調查局，約期詳商，並擬再與經國面談」。(頁 471) ㉟
- [02 月 19 日] 參加國史館晚宴，席散，將中美互換研究資料計畫草案交羅家倫。(頁 471)
- [02 月 20 日] 「復韋慕庭函，寄互換資料計畫案。」(頁 471)
- [02 月 21 日] 「訪張慶恩、吳慕風商中美互換研究資料問題，原則上調查局允參加，對於計畫草案亦同意，惟手續方面尚須向上級請示。」(頁 471)
- [02 月 25 日] 「劉子健來談中美互換研究資料計畫。」(頁 472)
- [03 月 14 日] 「韋慕庭來信，謂哈佛、耶魯、密西根、史丹佛及國會圖書館對交換資料事均有興趣，擬乘本月 20 日亞洲學會年會再與各方商洽。……與劉子健談中美學術界情勢，各有內幕。」(頁 476)
- [03 月 17 日] 「劉子健談中美學術聯繫事，謂應注意畢乃德 (Knight Biggerstaff)，其人頗中和。」(頁 477)

㉟ 參見張書，頁 44-45。按，日記此處之「司法部」，係指「司法行政部」，隸屬於行政院，1980 年 7 月 1 日起更名爲「法務部」。

- [03月19日]「劉子健談，勸於若干年後撰寫回憶性質之五十年史，不妨與美國人合作，意見頗好，但不必定與美國人合作。」(頁477)
- [03月20日]下午李煥來，「余建議由經國與費正清面談」。(頁477)
- [03月21日]費正清夫妻抵臺。「余與李濟之、葉公超迎於機場，……午後陪同參加美國大學聯合語文研習所。」(頁478)
- [03月22日]「劉子健電話見告，今早與費正清長談，對中美交換資料問題，認我方意見甚是。渠似無意去中南部旅行。」(頁478)
- [03月25日]下午陪費正清到近史所茶會。「費正清、李田意、劉子健建議聯絡在美學人之對中央研究院有關係者，形成一種組織，俾對史語所、近史所有所協助。」(頁479)
- [03月28日]「與劉子健商研究院與外國學人聯繫問題，子健主組成 Friends of Academia Sinica in History，甚好。」(頁479)
- [03月30日]「楚崧秋電話，謂調查局對交換資料忽生異議，聞係主管資料人意見，自私心作祟也。」(頁480)
- [03月31日]「劉子健來談，對交換資料事，主與調查局資料處主管人直接相商。……訪李煥，據告經國不願見費正清，……又談資料交換事，請再一詢陳大慶。」(頁480)
- [04月02日]「吳文津來臺，午前來談中美交換史料問題，必須慎重將事。又商民國史事日誌出版事。」(頁480-481)
- [04月03日]上午蔣廷黻抵臺，見蔣經國。「晚，約費正清夫婦、劉子健夫婦在家便飯，費正清談及西方認識出版及編製引得問題。」(頁481)
- [04月06日]「晚約吳文津、劉子健小酌，子健提及由近史所派員赴美學習文書檔案處理。……又與子健長談臺灣軍政內情及經國地位與自處之道。子健滿腔熱忱，殊可佩。關於赴美人選，余以為李國祁頗合宜。」(頁482)
- [04月07日]「吳文津來談，劉子健亦到。據子健云，已與亞洲協會通電話，以美金二千元補助李國祁，俟其自德返臺將轉往美國，作六個月逗留，再由各大學酌予生活費，亞洲協會已表贊同。」(頁482)
- [04月09日]「劉子健云，費正清對近史所青年同人印象至為深刻，將一力為助。」(頁482)
- [04月11日]「下午楚崧秋來談費正清近況及中美互換研究資料問題。」(頁483)
- [04月13日]費正清來談此行觀感(按，文長)。晚近史所同仁約費正清夫妻、劉子健、李田意夫婦便餐，賓主愉快。(頁484)
- [04月15日]晚到南港訪劉子健、李田意長談(按，有九項重點，內容豐富重要)。(頁484-485)
- [04月16日]約劉子健、李煥、楚崧秋、潘振球晚飯，談至深夜。劉子健對教育及資料交換等事頗多建議，「先從黨史會、近史所開始，調查局方面從緩。」(頁485)
- [04月17日]「下午李田意酒會歡送費正清夫婦」，劉子健、李濟、林致平、屈萬里等到。(頁485)
- [04月18日]陪蔣廷黻到南港，費正清、劉子健、李田意到。午飯時談中美合作事。(按，內容多，頁485-486)

〔04月19日〕費正清夫婦離臺。(頁480)

〔04月19-20日〕劉鳳翰將昨日事向《中央日報》報導，引起劉子健極大不滿。「經余解釋，稍為平靜。蓋渠恐消息傳至美國，引起阻難，復慮在臺發生不良反應，用心無他。昨晚倉促之間，余亦不曾仔細考慮，總以為借此多少可減少臺灣方面對費正清之懷疑也。」(頁486)

〔04月21日〕劉子健心稍平靜，誤會消除。(頁487)

從日記所載，在商定交換辦法的詳細過程中，劉子健對計畫的意見、提供中美學界內幕、傳達費正清對我方及對近史所及其同仁的肯定。劉更建議宜主動與調查局資料處主管直接商議，建議近史所派人赴美學習文書檔案處理，也倡議中美雙方形成一種聯絡組織等，可見他深入參與此事。

此外，從日記的眾多記載中，還可以看出郭與劉兩人對國政的關懷與彼此的情誼。其一是4月6日記吳文津來臺，郭宴請吳、劉二人後，記下「又與子健長談臺灣軍政內情及經國地位與自處之道。子健滿腔熱忱，殊可佩。」⁴⁰內容雖簡略，可見劉子健對時局的瞭解和意見，獲得郭廷以高度認同。

其二是4月15日郭詳細記下他與劉子健、李田意長談中，二人對近史所的發展，提供許多寶貴建議。例如針對爭取基金支持，加強海外聯繫，及早規劃福特第二期補助，鼓勵撰寫同仁專刊之書評，廣為宣傳，增派出國人員了解研究情形，多向人請教、少發表意見，及出版品編製索引等大小九項具體建議。⁴¹顯示他們對近史所研究成長十分關心。

在兩人交往過程，郭廷以也深覺劉子健對國事的關切，可以進一步與自己熟識的黨政師友聯絡，並向他徵求意見。1964年4月16日郭邀劉與李煥、楚崧秋、潘振球晚宴，並長談到深夜。劉對教育議題所提建設性的意見，郭認為「均屬有意義之事」。針對資料交換的問題，劉子健建議約相關人士細談，先從黨史會、近史所開始，調查局從緩。⁴²此一看法成為此後計畫執行方案。⁴³

1964年6月30日劉子健離臺後，《郭廷以日記》記述中美雙方交換資料的具體進展，達十九筆之多。⁴⁴此後由於受到國內諸多牽扯，致整個計畫的後續進展並不順

⁴⁰ 《郭廷以日記》1964/04/02及1964/04/06，頁480, 482。按，04/02美方派吳文津來臺商討具體執行方案；04/06劉子健建議由近史所派員赴美學習文書檔案處理，郭表明「關於赴美人選，余以為李國祁頗合宜」。

⁴¹ 《郭廷以日記》1964/04/15，頁484-485。按，李田意為耶魯大學教授，此時與劉子健同在史語所擔任訪問學人。

⁴² 《郭廷以日記》1964/04/16，頁485。

⁴³ 3月30日楚崧秋告知，調查局對資料交換忽生異議。「關係主管資料人意見，自私心作祟也」，次日劉子健曾建議直接與主管人員談，但均無具體結果，只得聚焦於沒有疑義的資料如何規劃執行。《郭廷以日記》1964/03/30-31，頁480；並參見張書，頁46-47。

⁴⁴ 《郭廷以日記》1964/07/21，頁505；1964/08/04，頁509；1964/08/11，頁510；1964/09/21-22，頁520；

利，如郭於1966年1月6日回覆劉子健信中，正式提到編目工作三個月內可完成，⁴⁵實際上，編目工作於1966年2月開始，一直到1967年5月，完成約四萬餘條的目錄，涵蓋1902至1949年報紙、雜誌、公報及一般資料，多數為黨史會所有。近史所所有者，則為1901至1926年的外交檔案，張朋園對此事未能竟全功，有具體說明。⁴⁶但無論如何，整個資料攝製、交換計畫，從推動到執行的過程，劉子健認真地克盡其協助溝通規劃的責任。

五、講座案

中美交換縮微資料計畫，美國的主要推動者是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而謀畫向美國基金會爭取經費資助設置講座案，協助近史所和史語所的發動者，則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張書指出，費正清於1964年他和夫人訪臺時，為提升史語所與近史所的學術水準及留住人才，發起倡議，並爭取蔣廷黻的協助，擬透過中華教育基金會資助這兩個研究所。⁴⁷

3月21日費正清抵臺，開始近一個月的訪問活動。費正清是美國學術界、政治上深具影響力的學者，雖與胡適等自由派學者往來密切，但對時政頗有批評，致引發部分國民黨學者的敵視，並藉他攻訐自由派學者，造成許多紛擾。郭廷以基於費正清在美國政、學界的巨大影響力，歡迎費的來訪，但為化解糾結，曾費力周旋排解，如請李煥轉達，期待蔣經國和費面談，不過蔣認為費對臺灣造謠侮蔑，不願與他見面。⁴⁸甚至連院長王世杰也認為費是敏感人士，不安排他住南港，而是住在市區的旅館，讓情況顯得十分尷尬。⁴⁹但為方便費正清參與近史所的學術活動，郭幫費安排研究室，以方便與同仁接觸、聯繫。此時顯然因劉子健在其中溝通，扮演滑潤的角色，得以化解尷尬，例如劉子健於費正清來臺的次日，和費長談之後，即電告郭廷以，表明費「對中美交換資料問題，認我方意見甚是」，並說他們無意去中南部旅行。⁵⁰25日近史所歡迎費正清的茶會後，費正清、李田意和劉子健三人，曾討論如

1964/09/24，頁521；1964/10/06，頁523；1964/11/30，頁535；1964/12/26，頁540；1965/03/24，頁560；1965/04/12，頁564；1965/04/21，頁566；1965/04/28，頁568；1965/05/01，頁569；1965/05/07，頁570；1965/05/17，頁572；1965/06/14，頁578；1965/06/19，頁579；1965/06/24，頁580等。

⁴⁵《郭廷以日記》1966/01/06，頁620。

⁴⁶張書，頁48-49。

⁴⁷張書，頁49-51。按，張書第50頁敘述費「擬在近史所和史語所分別設置5至7個講座」。但據該書「附錄4」費正清草擬的講座計畫“Rough Draft for Selective Use in a Statement”，應是兩個研究所合計每年5至7個講座，預估設置20至30年，總共需要約100萬美元至150萬美元（見張書，頁152-153）。

⁴⁸《郭廷以日記》1964/03/20，頁477；1964/04/03，頁481。

⁴⁹《郭廷以日記》1964/03/21，頁478。王世杰雖認為費正清「曾為中共張目」，仍於4月1日晚宴費氏夫婦。見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下冊，1964/04/01，頁1031。

⁵⁰《郭廷以日記》1964/03/22，頁478。

何聯絡在美學人之對中央研究院有關係者，形成一種組織，俾對史語所、近史所有所協助。28日郭進一步和劉子健研商研究院與外國學人聯繫問題時，劉主張組成 Friends of Academia Sinica in History，郭甚表贊成。4月9日劉子健特向郭表達「費正清對近史所青年同人印象至為深刻，將一力為助」，劉子健看到費訪臺的過程中，郭苦心化解與處境的艱難，進而出手協助，讓郭覺得很窩心。⁵¹相反的，楚崧秋4月11日拜訪郭廷以，藉以瞭解費正清近況及中美互換研究資料問題，就讓郭十分不滿，向羅家倫抱怨「有關方面不免小題大作，迹近張惶」。⁵²

郭廷以對費正清訪臺的用心和努力，終於得到溫暖的回報。4月13日費正清跟他談此行觀感時，讚揚四年來臺灣學術和經濟的進步，他表明個人沒有政治企圖，願意協助中研院，尤願盡力協助近史所及史語所，盼能為兩所募集百萬美金作基金，使研究工作得以長期順利進行，且願於返美後推動福特二期補助案；同時，對郭個人和所務有很多期許。郭適時向費說明，對中研院和臺灣所處的環境，說「在目前環境，不可責之太切」。15日郭專程訪劉子健、李田意詳細交換意見，他記下九點要項，多為回應費正清的期待相關。其中關於募集基金一事，是「費正清對募集近史所、史語所基金事極為熱心，將來在技術上擬請中華教育基金會經營，應先與蔣廷黻一談」。⁵³

此時我駐美大使蔣廷黻正於4月3日返臺，郭廷以安排蔣於18日上午到南港，參加近史所與同仁舉行的「談話會」。當天午餐會上，蔣廷黻與費正清商談今後近史所研究問題，認為目前所缺的是經費。「費先生說明在美募集基金計畫，蔣先生深表贊同，並願由中華基金會協助。」⁵⁴下午費正清與郭廷以續商進行步驟，具體提出邀請美各大學相關人士協助，目標為一百至二百萬元，將來分配比例史語所不妨略高。4月19日下午費正清離臺前和郭見面時表示，費上午已和李濟詳談，李甚同意，待李濟與郭會商，費抵東京後將起草計畫說明書。⁵⁵近史所認為此次費、蔣會談籌劃基金，是一件大事，遂由劉鳳翰擬稿，將蔣費二人同意為近史所籌劃經費之事送《中央日報》報導。此事見報後，劉子健大為不滿，他認為這一事在未定案前冒然公佈，擔心在美國引起阻難，在臺灣也造成不良反應，經郭解釋才平息。郭自責決定過於倉

⁵¹ 《郭廷以日記》1964/03/25及03/28，頁479；1964/04/09，頁482。

⁵² 《郭廷以日記》1964/04/11-12，頁483-484。

⁵³ 《郭廷以日記》1964/04/13&15，頁484-485。

⁵⁴ 《郭廷以日記》1964/04/03，頁481；1964/04/18，頁485-486。蔣廷黻於近史所談話會的發言內容，見劉鳳翰，〈蔣廷黻博士對中國近代史上幾個問題的見解〉，《傳記文學》7.6（1965）：27-28。按，蔣廷黻逝於1965年10月9日。按，比對郭的日記及蔣廷黻的日記，兩人記述同日同事，但蔣的贊同強度與郭感受到的，稍有落差。郭記「蔣先生深表贊同，並願由中華基金會協助」，但蔣記「Lunch with the members. John Fairbank joined us and talked about trying an endowment for 史語所&近史所. I thought China Foundation might help.」見 *Tsiang Diaries*, 1964/04/18。按，《蔣廷黻日記》以英文記述，這裡使用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藏哈佛大學微卷之影印本。

⁵⁵ 《郭廷以日記》1964/04/19，頁486。費正清1964/04/20即草擬講座計畫書“Rough Draft for Selective Use in a Statement”，見張書，「附錄4」，頁149-153。

促，但也自解想藉此事降低臺灣方面對費正清的懷疑。⁵⁶關於這件事，賈廷詩的訪問紀錄裡也有記述，但賈認為此事與福特基金會有關，似有誤。⁵⁷

由於這項基金的額度相當龐大，除了中美雙方要溝通經費安排外，實質上涉及中央研究院及近史、史語二個研究所，由於王世杰、李濟與郭廷以三方關係微妙，劉子健又在其中扮演魯仲連的角色。張書引用郭廷以、劉子健的信件及《王世杰日記》，清楚看到劉的角色。不過，張書對此後發展所記相當簡略，⁵⁸《郭廷以日記》則有詳細記載，王世杰的日記亦偶記及，依二人的日記，我們可以較完整看出事情的發展及關鍵性的轉折。

費返美，適劉赴日訪問，此事暫無進展。5月7日郭收到費正清寄來為史語、近史兩所籌募基金之計畫說明書草稿，內容與費離臺前一致，11日王世杰亦於院務會議後，留李郭二人商量費正清籌款計畫，取得一致意見。晚上，劉子健向郭報告先前和李濟長談的結果後，郭記下「李對余之態度甚為高興，以余表示尊重渠之意見，將來募款有成，兩所分配，當讓史語所優先也」，並記下劉對獲致如此結果，似頗為得意。⁵⁹次日上午，王世杰院長與劉商酌在美募集經費或設立講座，以鞏固史語所與近史所之人才與工作，王也透露李濟不滿近史所，認為李胸襟似太苛狹。⁶⁰隨後劉頗為滿意地向郭報告，說他已將費正清籌款計畫詳細向王院長說明，並重促協商中美互換史料事。⁶¹在劉子健溝通的基礎上，14日郭李劉三人正式和院長詳商，惟王世杰對由費正清出名，頗有顧慮，經三人詳細說明才暫釋懷。「李濟之話尤得體，表示兩所充分合作，將來在美進行，任其事者將包括有關各大學學者，以第三者經辦，並不正式牽連中央研究院」，最後決定由李濟與郭函復費正清，贊同試辦。⁶²

然而，王院長仍對募款一事有所顧忌，既擔心費正清出名，會引發政府當局不滿，對他不和，又怕費別有用心，牽連研究院，遂再約郭商談。⁶³郭深感「王先生在政界太久，近年處境微妙，不甚得意，不敢放手作去也」，顯見二人立場與心態明顯有別，讓郭頗覺煩憂。⁶⁴5月17日王院長又向李濟表明他對費正清計畫的態度，「余之結論為不願由費發起，故請其回信時，勿告以余知此事或同意其議。余意可向美國

⁵⁶ 《郭廷以日記》1964/04/19-20，頁486。

⁵⁷ 沈懷玉訪問，張成璋紀錄，〈賈廷詩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337-338。按，此時臺灣對費正清的言論頗有爭議。

⁵⁸ 張書，頁51-53。

⁵⁹ 《郭廷以日記》1964/05/11，頁490。

⁶⁰ 《王世杰日記》1964/05/12，頁1036。

⁶¹ 《郭廷以日記》1964/05/12，頁491。

⁶² 《郭廷以日記》1964/05/14，頁491。

⁶³ 《王世杰日記》1964/05/12，頁1036，王認為「余對費正清出面發起一點，殊認為不妥，對於其提議亦認為不妥。」

⁶⁴ 《郭廷以日記》1964/05/16，頁491-492，王院長「約談募款事，仍顧慮費正清出名經辦，一以此間政府當局對費不滿，恐於己不利，一以疑費別有居心，研究院受其牽制。余謂此可於技術方面設法，由在美中國學人主動。王先生在政界太久，近年處境微妙，不甚得意，不敢放手作去也。」

若干基金會申請研究講座，不宜採募捐方式」。⁶⁵ 18日李濟向郭說，院長對募款事仍持不同看法，也不置可否。據李分析，除政治顧慮外，王實欲將此事納入他擬議的中美科學合作計畫中，當成自己的成績，批評王持的態度實是近於官僚，憤慨表示研究院近年已成為衙門化。郭則認為照舊進行，一旦有成，王不致於反對。19日郭和劉子健商量，覆函費正清表達「原則同意，詳細辦法續議」。⁶⁶ 其後，李又表示王院長態度反覆，仍持己見，不知學術研究為何事，全為官僚作風，甚表憤慨。劉子健亦有同感，但持積極看法，郭認為劉是有心人。⁶⁷

5月25日晚，王世杰約陳雪屏、李濟、羅家倫商費正清計畫，力主慎重，不輕易發動。⁶⁸ 26日王世杰再單獨和郭談費正清籌款計畫，表示暫不願進行，等秋後李濟去美後再商，並對事情發展原委不清楚表達不悅。⁶⁹ 至此（1964年5月26日），王院長不願意進行講座案的態度，已十分明確。

劉子健感於研究院情況複雜，於6月8日向郭表示研究院事如各所態度一致，則院方麻煩自可減少，期望各所意見一致，並說要向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說明院內情況。16日劉又對郭說費正清協助近史所及史語所計畫，仍照舊進行，將先與韋慕庭等詳商。郭有感於劉子健熱心協助推動學術合作交流並關心國政，「對國事甚熱誠」，既多引介參與黨政人士如李煥、楚崧秋、潘振球等聚會，提供建言。6月29日劉離臺前夕，郭更安排劉面見蔣經國，劉建議多邀請海外各領域專家訪臺，徵求意見，二人晤談甚為愉快。⁷⁰

講座案一事，從4月13日費正清發起動議，得到蔣廷黻有意支持，若能成功推動，將對近史所和史語所的研究發展帶來極大助力，因此兩位所長積極奔走，劉子健也從旁溝通協調，情勢頗為樂觀。但隨之而來的，是受阻於對政治敏感過度、又希望朝自己規劃方向發展的王世杰院長。王世杰的拖延應付，致整個計畫仍只停留在表達意願的私下連繫。劉子健離臺後隨即赴歐訪問，此後多數的連絡工作，轉由何廉負責。⁷¹

9月26日費正清函告郭已著手籌募基金。⁷² 其實在21日費即致函蔣廷黻大使，

⁶⁵ 《王世杰日記》1964/05/17，頁1037。

⁶⁶ 《郭廷以日記》1964/05/18-19，頁492。

⁶⁷ 《郭廷以日記》1964/05/21-23，頁493。《王世杰日記》1964/05/23，頁1038，「濟之仍接受我的意見，函復費正清，謂此事尚需從緩計議。」

⁶⁸ 《王世杰日記》1964/05/26，頁1038。

⁶⁹ 《郭廷以日記》1964/05/26，頁494。

⁷⁰ 《郭廷以日記》1964/06/08，頁497；1964/06/16，頁498-499；1964/06/27（記劉「對國事甚熱誠」）及1964/06/29，頁501。

⁷¹ 《郭廷以日記》1964/09/04，頁516；1964/09/10，頁517；1964/09/21，頁520；1964/10/01，頁522；1964/10/09，頁524；1964/10/22，頁527。

⁷² 《郭廷以日記》1964/09/26，頁521，郭收到費來信表示，「基金事已著手進行」。

擬邀幾位教授到華府，商討基金會事宜，⁷⁵與何廉信中所說一致，⁷⁴隨後何致函郭，說費、韋等人將於10月底去華府，卻也透露籌集基金「並不簡單」、「恐不易如願」。⁷⁵依何廉的來函與張書的研究可知，1964年7月至10月之間，費正清邀集美國學界為兩所講座籌款的提議，美國學界領袖的支持意願不高。⁷⁶

1964年10月23日以後，關於籌集講座基金一事，郭廷以的日記中不見具體記載，筆者推測可能與9月20日即中秋後，近史所的同仁魏廷朝、吳章銓二人因牽涉彭明敏被捕的政治事件有關。⁷⁷10月24日，《紐約時報》刊出彭明敏被捕新聞。⁷⁸《紐時》新聞刊出後，11月2日郭就接到蕭公權、袁同禮、費正清等人來信關切，費正清尤多批評。此函對郭形成極大壓力，郭認為費正清不明真相，次日即覆函澄清，說彭、魏等人是搞獨立運動。⁷⁹不久，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張朋園也函告韋慕庭對彭、魏被捕的關懷，並說美方指責頗力。⁸⁰費正清11月4日投書《紐約時報》抗議國民政府的作為，郭看到剪報的反應是「此公成見仍深」。⁸¹張書推測費曾將郭11

⁷⁵ 張書，頁53，註39，“John K. Fairbank to T. F. Tsiang, 1964.9.21”。

⁷⁶ 《郭廷以日記》1964/09/21，頁520，郭收到何來信表示，「費正清為近史所、史語所籌集基金事亦在計議」。

⁷⁷ 《郭廷以日記》1964/10/01，頁522記何廉來信說，「籌集兩所基金事並不簡單」。1964/10/22，頁527記何廉來信說，「費正清、韋慕庭月底赴華盛頓與蔣廷黻商史語所、近史所基金事，恐不易如願」。按，何廉致郭信，均在彭明敏案正式公開之前，他可能純感於基金案金額龐大，在美募款不易，因此，先於10月上旬就建議將籌款計畫改為五年或十年，不致如費正清所擬二十至三十年之長。見《郭廷以日記》1964/10/09，頁524記何廉來函建議「近史所及史語所籌款事，不妨定五年或十年計畫」。

⁷⁸ 張書，頁51-52。

⁷⁹ 《郭廷以日記》1964/09/24，頁520記今日得悉吳章銓、魏廷朝兩人均於3日前失蹤；1964/09/26，頁521記「吳章銓已無事回所」。張書，頁115。沈懷玉訪問，張成璋紀錄，〈賈廷詩先生訪問紀錄〉，頁344-346。另，關於彭明敏被捕消息公開後，國外學政界的反應及彭案的發展，學術論著很多，可參見：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1964-1972）——從外交部檔案看到的面向〉，《國史館學術集刊》10（2006）：194-198（<https://doi.org/10.7058/BAH.200612.0189>）。

⁸⁰ “Taiwan Accuses Professor of Independence Activity,” *New York Times*, 1964.10.24, p. 8. 又，彭魏9月被捕時，消息並未在國內公開，直至10月24日才有新聞報導，見〈彭明敏等三人從事破壞活動，經逮捕偵查中〉，《聯合報》1964.10.24，第2版。全篇報導僅有6句：「[本報訊] 警備總部發言人段春理少將23日下午發表談話稱，嫌犯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3人，於9月間臺北進行破壞活動，經治安機關在現場發現逮捕，並當場搜獲犯罪證據，現正依法偵查中。」

⁸¹ 《郭廷以日記》1964/11/02-03，頁529。郭於11月2日收到蕭公權、袁同禮、謝文孫、王正義、徐家璧、王爾敏、張朋園、Michael、費正清、曹德宣等10人來信，郭記費正清「為彭明敏、魏廷朝等被捕事有所論列，而實不明真相」。郭立即於隔日（11月3日）「復費正清，說明魏廷朝案真相，並另函告楊聯陞」。張書，頁115。

⁸⁰ 《郭廷以日記》1964/11/07，頁530記「張朋園來信，謂韋慕庭對九月間彭、魏被捕事亦至關懷。美方指責頗力。即請呂實強先代覆，日內當另向韋慕庭說明」。

⁸¹ 《郭廷以日記》1964/11/13，頁531記「費正清致書《紐約時報》，說明彭明敏事件，似係得余去信後所採取行動」。1964/11/17，頁532記收到何廉寄來費致《紐約時報》函之剪報，「此公成見仍深」。按，查1964年臺灣還沒有國際快遞公司進駐，航空郵件最快也要5至7日才能寄達美國；當年國際長途電話非常昂貴且需要接線生服務，一般機關或家庭並不會設置；傳真機則要等到1980年代才普及全世界，因此，郭與費之間互相聯絡，主要依賴紙本書信。郭雖於接信隔日（11月3日）立即回應費正清，費實則已於11月4日投書《紐約時報》，還來不及看見郭的回函。《紐時》11月12日在第36版「讀者投書欄」刊出費之投書，見 Letters to *The Times*, “Taiwan Scholar’s Arrest: Harvard Colleague of Professor Peng Questions Regime’s Action,” *New York Times*, 1964.11.12, p. 36. 《紐時》在此篇讀者投書最末，顯示投書人姓名、地點以及投稿日期為“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Nov. 4, 1964.”

月3日的回應函轉傳給他的學生，此時在耶魯任教的 Mary Wright 希望費正清不再繼續支持郭廷以；費在回信中表明「老郭……是個軟腳蝦，……不屬於我們為自由奮鬥的一群，以後不會再為他們搞錢了」。⁸²

彭、魏案所延燒的政治風暴，顯然影響駐美大使蔣廷黻。10月30日費、韋、劉三人到華府與蔣廷黻大使會商籌款時，蔣雖然豐盛的招待，但對籌款事未有肯定承諾。⁸³因此，劉子健致信郭廷以也說，費正清等為中央研究院籌款事發生困難。⁸⁴

12月3日郭在日記中雖僅記「劉子健來信，將去 Princeton」，其實從這封信可以看到更豐富且具體的內容。劉信的文字雖然隱晦，但明白表示魏廷朝被捕後美國學界的反映：「返美後多事費心，費、魏（韋）指摘一事，健早已竭力解釋，然亦不甚生效。……最重要原因如此間公私各方消息較多，即先生近函之官方消息，亦早有所聞，並謂其中曲折尚多。總之，實情並不如此嚴重，而處理經過則過當。……最令扼腕者仍○○夫婦態度，……募款一事停頓，俟機再動。而關於史料影製一事，商談經年，尚無具體目錄。擬請各校合籌一小數，先編目錄，英文已請吳文津兄以請假一年之力，對國內各校及外國對當代史料作一有系統調查」。⁸⁵

前述美國學界對兩所講座募款的支持意願既不高，再結合觀察劉子健感恩節這封信與費正清給 Mary Wright 的信，相信彭魏被捕，讓講座案變得更加不順。張書所稱中基會財力不足，可能只是因素之一或表面的理由。⁸⁶況且，王世杰院長不願意進行講座案的態度，以致籌募講座資助史語所、近史所兩所一事，遂實質停頓。⁸⁷

此後費、韋仍與郭多有聯繫，例如到次年2月12日費正清來信表明對魏廷朝事件完全諒解，於近史所仍力表支持，並已發出通告，盼美國各方續予近史所及史語所具體協助。⁸⁸

⁸² 張書，頁115及註58。

⁸³ 張書，頁53。張書說蔣「只談不著邊際的話」，但蔣廷黻在其日記記下兩所講座籌款之事，費認為中方籌款行動應在美方之前，與蔣意見不同，雙方並未再進一步具體討論講座案；其後大家則討論中基會推動比照《劍橋史》的中國通史計畫，找專家撰寫，組織編輯委員會，由中基會與美國基金會各付一半費用等。見 *Tsiang Diaries*, 1964/10/30。

⁸⁴ 《郭廷以日記》1964/11/19，頁532記「劉子健來信，費正清等為中央研究院籌款事發生困難。即復之，可聽其自然」。

⁸⁵ 《郭廷以日記》1964/12/03，頁535，郭接到劉來信。劉子健，〈致郭廷以信函〉，1964/11/27感恩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館藏號：069-01-02-154。

⁸⁶ 張書，頁53。

⁸⁷ 經查史語所藏公文檔案，史語所於1965/06/01函請院方向中基會提出講座申請，每年2名講座，每人每年2,000美元，講座的規模與經費明顯縮小。中基會則於1965/09/24開會通過，1965/09/29函知史語所此案自1966年起資助。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34次年會紀錄“Minutes of the 3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1965/0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檔案」，館藏號：502-01-03-027；或「胡適檔案」，館藏號：310-01-10-003-016。另見《郭廷以日記》1966/06/13，頁651記，「與李濟之談講座事，謂余實不能有多少時間用於研究，受之不安。濟之云渠亦有同感，但為顧及當事者之困難，仍勸余勿堅拒，於王雪艇電話，謂決定提出。」

⁸⁸ 《郭廷以日記》1965/02/12，頁551。

由於王世杰既對費有疑懼，此後遂順勢轉到他更關注參與並可以達成（如李濟所說個人願望）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領域與美國學術界交流合作的全院性組織——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的組織與推動。此事雖與近史所仍有關係，但已擴及中研院人文社會各所，不單是近史所事務。同時劉子健由史丹福大學轉到美東的普林斯頓大學，專注宋史研究，是以自1966年以後，兩人較少聯絡。郭廷以在國內及所內面對的問題日益複雜，疲於奔命，心力交瘁，逐漸萌生退出他筆路藍縷辛苦經營的學術殿堂，屈身美國，⁸⁹專事撰寫《近代中國史綱》，頗有有家歸不得之苦，遂致憂懼辭世。

六、協助青年學者

近史所成立初期，除了高階研究員張貴永、陶振譽、楊紹震、胡秋原四人與郭廷以同輩，而副研究員黃嘉謨（1916-2004）年齡略大，王聿均（1919-2007）、李毓澍（1919-1995）與劉子健同年外，其他大多數助理研究員、助理員都較年輕。⁹⁰研究人員當中，部分同仁獲基金資助到美、日、德等地進修，尚有不少未曾出國，他們的治學方式仍循郭廷以透過檔案整理進行專題研究，內容雖然堅實，但視野與方法仍待加強。故而劉子健特別關心近史所青年人才的培育。1963年1月劉子健與郭見面時，即勸郭「以全力扶植青年學人」。⁹¹劉協助近史所扶植青年學人的方向有三：

（一）至近史所演講及交流

在郭廷以的邀請下，劉子健有二次到近史所演講並交流意見：一是1963年10月3日劉子健在近史所討論會介紹美國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例證，兼及日本資料，郭廷以記下「同事發問頗踴躍，子健應答亦得體，甚有意義」；次年6月20日劉子健返美前，又為近史所同人講1927-1945年中國對日本政策。此次演講側重研究方法，郭廷以說「看來似頗新穎」。⁹²劉子健本身的研究重心雖已轉至宋史，他仍願意藉演講、交流的機會，協助開拓近史所青年學者的視野與方法，郭廷以十分肯定。

⁸⁹ 依陸寶千所述，「量字師之赴美不歸是1969年9月3日」。見《郭廷以日記》，〈前言〉，頁iii。關於郭廷以赴美不歸的原因，有諸多說法。可參見楊金華，〈郭廷以晚年緣何赴美未歸〉，頁41-57。

⁹⁰ 查近史所向福特基金會申請補助案的計畫書（1960年10月）以及1961年近史所提供給《東亞學術研究委員會中日韓第一次會際會議報告》，近史所當時的青年同仁如下：助理研究員呂實強、李國祁、李念萱、鄧汝言、王爾敏、王靈、張存武、王樹槐、李恩涵，助理員謝文孫、趙中孚、劉鳳翰、呂士朋、許淑真、李作華、王執文、駱雪倫。見潘光哲編輯，「郭廷以先生遺稿輯存」，收入《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6（2003）：91-92, 95-99。

⁹¹ 《郭廷以日記》1963/01/02，頁373。

⁹² 《郭廷以日記》1963/10/03，頁441；1964/06/20，頁499。

(二) 建議鼓勵青年學者出席國際會議

劉子健也建議鼓勵青年學者出席國際會議，加強交流，培育膽識。1964年4月費正清到中研院訪問並於4月6日在近史所演講後，劉子健即向郭廷以轉達費正清對近史所青年同仁的深刻印象，費將盡力協助。⁹³先是美國東方學會訂於1964年1月在印度舉行會議，特邀請李濟與郭廷以參加，費用由亞洲協會負擔，郭擔心「此會在印舉行，政治情況複雜，必須慎重」，無意與會，劉子健建議派青年觀察員前往，認為這是讓青年學者學習的好機會，⁹⁴可惜此議並未實現。劉子健返美後，曾於1965年4月27日寫一封長信給郭廷以，訴說他參加中美合作會的感慨。劉子健認為此會是大事，我國人文社會學者應積極參與，可惜在舊金山與紐約兩次會議，人文學者僅他和李濟出席，更感失望的是「此次在紐約、在舊金山兩會，並無其他院士列席，除濟之先生外，健乃唯一華人，……深孤掌難鳴之苦」，特別表達「院士不肯多奔走，則啓用年青人往來兩國」，並指這是他竭力協助李國祁訪美及向李濟建議派許倬雲訪美聯絡的本意。他認為「派青年連絡，然大有妙用，一則身分問題，較可多方探討，二則如此議不妥，則高層尚有轉圜餘地。試觀美方屢屢派遣年青之 sheep 即有此妙用也」，⁹⁵從信中深切反映劉子健對培育青年學者的用心。

(三) 協助籌措李國祁的訪美經費

1963年9月17日李國祁自德來信表明學成取得博士學位即歸國，郭十分高興且覆函鼓勵，郭年屆耳順，已有意扶持年輕人接班。⁹⁶1964年3月費正清來臺並推動與中研院的合作計畫後，4月6日劉向郭提議由近史所派人赴美學習文書檔案處理，期有助於青年學者了解有關中國研究情況，俾將來協助近史所工作。郭同意劉的意見，並表明自己心中赴美的理想人選是李國祁。⁹⁷1964年4月7日劉子健立即與亞洲協會通電話，告訴郭廷以，已獲得亞洲協會贊助美金二千元，「俟其自德返臺將轉往美國，作六個月逗留，再由各大學酌予生活費」。⁹⁸郭得知後致函詢問李國祁何時返臺，屆時擬請其轉赴美國，分別訪問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密西根、芝加哥、柏克萊、西雅圖、史丹福各大學，了解彼方情況，以利「回近史所協助余（郭）之工作」，費用由亞洲協會及美國各大學設法。⁹⁹劉郭二人培植李國祁的意見既一致，郭多次致函李國祁，反覆磋商返臺、赴美行程，並請費正清、韋慕庭、劉子健等人協助。

⁹³ 《郭廷以日記》1964/04/09，頁482。

⁹⁴ 《郭廷以日記》1963/10/03，頁441。

⁹⁵ 《郭廷以日記》1965/05/01，頁569。郭收到劉子健此信。劉子健，〈致郭廷以信函〉，1965/04/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郭廷以檔案」，館藏號：069-01-02-154。

⁹⁶ 《郭廷以日記》1963/09/17，頁438；1964/01/12，頁462。

⁹⁷ 《郭廷以日記》1964/04/06，頁482。

⁹⁸ 《郭廷以日記》1964/04/07，頁482。

⁹⁹ 《郭廷以日記》1964/04/11，頁483。

郭廷以看重李國祁的學術和行政能力，擬積極栽培、提攜渠為所長接班人，但後來遭到挫折。之間的變化，近史所前輩包括李國祁本人也有所解釋。¹⁰⁰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訊息，由於立場不同，說法不一，真象已不易釐清。不過，檢視郭廷以日記的詳細記載，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事情發展與轉變的過程。

1960年代臺灣管制人民入出國甚為嚴格，李國祁赴美及家眷返臺，涉及旅費、簽證，乃至在近史所聘任等事，事務十分複雜、繁瑣。郭廷以以為此事與各方反覆磋商討論，極為費心，其過程均詳記於日記。

首先，經費籌措即頗有周折。郭1965年3月30日收到兩封來信，第一封是劉子健告知李國祁訪美費用，向美國各大學籌款僅得七百元，費正清籌得五百元；第二封是韋慕庭回信歡迎李國祁訪哥倫比亞大學，但未提費用。郭覆信劉子健表示，「李國祁訪美生活費如不足，近史所可另行設法」，並函請亞洲協會確定李國祁旅費。¹⁰¹

其二，李國祁及其家眷的回國時間反覆。一開始是李取得博士學位的時程不確定，後來眷屬之規劃與李國祁無法同步，連動影響到返臺、訪美的行程安排變化，同時也造成李國祁及家眷的簽證、旅費暨生活費補助等諸多細節，不得不更改多次。郭為此往返連絡費正清、劉子健、李國祁，從1964年4月到1966年8月，郭廷以身為師長，耗費心力為李國祁打點各類事務，過程曲折，且未能如其所願，但其執意之堅，值得感佩。劉子健在整個過程中盡心襄助，顯然也扮演著相當積極的角色。¹⁰²

其三，因近史所所內人事糾葛，李國祁取得博士返回近史所任職的過程、職位及待遇等，未能符合自己的期待，引發李不滿。¹⁰³李國祁於1966年4月30日正式應聘，8月離德赴美訪問。¹⁰⁴訪問期間，於喬治華盛頓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等校，得知美國學界對近史所之好評。¹⁰⁵惟李10月29日表示返臺護照加簽發生周

¹⁰⁰ 陳儀深訪問，潘彥蓉紀錄，〈李國祁先生訪問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133-168。

¹⁰¹ 《郭廷以日記》1965/03/30，頁561；1965/04/01，頁562。

¹⁰² 《郭廷以日記》1964/04/11，頁483；1964/06/13，頁498；1964/07/23，頁506；1964/10/27，頁528；1965/02/18，頁553；1965/02/23，頁554；1965/03/12，頁557-558；1965/03/30，頁561；1965/04/01，頁562；1965/05/20，頁573；1965/06/03，頁576；1965/06/16，頁579；1965/07/24，頁587；1965/07/29，頁588；1965/08/01&08/05&08/10，頁589-590；1965/08/21，頁592；1965/08/31，頁595；1965/09/16，頁597；1965/10/07，頁601；1965/11/22，頁610；1965/12/20，頁615；1965/12/30，頁617；1966/02/08，頁626；1966/02/21，頁628；1966/02/25，頁629；1966/04/25，頁640；1966/05/03，頁642；1966/05/19，頁646；1966/05/29，頁648；1966/06/11，頁651；1966/06/22，頁655；1966/07/26，頁662；1966/08/02，頁664；1966/08/09，頁665；1966/08/22，頁668；1966/09/02，頁671。

¹⁰³ 《郭廷以日記》1965/04/24，頁567（王院長同意聘李國祁）；1965/08/10，頁591（收到李國祁寄學位證件）；1965/12/28，頁617（近史所所務會議正式聘李國祁為副研究員）；1966/02/26，頁629（王院長面告李國祁住宅事可設法）；1966/04/09，頁637（王院長談及李國祁聘任事，支吾其詞）；1966/04/11，頁637（中研院院務會議正式通過聘任李國祁）。

¹⁰⁴ 《郭廷以日記》1966/04/30，頁642記「國祁來信，正式應近史所聘，八月赴美」。

¹⁰⁵ 《郭廷以日記》1966/09/12，頁673；1966/09/20，頁675；1966/09/29，頁677；1966/10/04，頁678；1966/10/07，頁679；1966/10/11，頁680；1966/10/18-19，頁682。

折，11月上旬返臺意念似動搖，郭「當再加勸慰」。¹⁰⁶ 11月中旬李國祁到史丹福大學，突然致函郭廷以，表明將返西德，放棄回臺原議，擔心返臺有生命安全問題，郭覺得李的說法「誠不知所云」。¹⁰⁷

李國祁到史丹福大學後，返臺計畫驟然生變，這出人意料的發展，打破郭廷以的原訂計畫與安排，讓他深感困擾。除不斷寫信勸慰督促外，也請謝文孫、呂實強多方勸解。但所得的消息，都相當負面。如12月1日，郭記下「國祁覆呂實強信，謂余對其返臺後待遇等迄無切實表示，至為不滿，甚至責余玩弄手段。無怪其久不答余信。下午作一長函，懇切說明所謂安全、住宅、名義三點，及近史所將來安排，能否見聽，則非所知矣。甚矣人之難處也。」12月5日又記下「得謝文孫信，始知李國祁到美後受到若干不滿於近史所之中國人之閒言，而以何炳棣為最，是以態度大變。經余去信解說，似有回轉意。文孫日內到臺，將實情電告，彼或可望於返西德後回臺。國祁亦有書至，對於名義、待遇表示不懌，而於覆呂實強信中對余頗為不諒。處人真不易，惟仍以坦誠對之。即覆一函，再加勸告。如果斷然決絕，祇好聽之。」¹⁰⁸ 後續發展在日記亦多有記載，及至李國祁明確表示不再回臺，此事遂告一段落。¹⁰⁹ 郭廷以雖然未能成功扶植預想的所長接班人，他旅居美國後，與張朋園諸多聯繫的書信中，仍一再表示對李國祁學術成績的肯定與關懷。¹¹⁰

七、結語

劉子健與郭廷以締交為時雖短，以其身分和能力化解人際間的矛盾，並協助郭廷以爭取海外學界資助，強化青年學者視野及學術能量等諸多努力，雖然因環境之限，未竟其功，但在密集的往來過程中，看出二人是相知相惜的忘年知友，顯然是何廉之外，郭廷以最重要的助力。

本文所述的微縮案、講座案，以及鼓勵青年學者參與國際活動、資助李國祁等案，當時若能一一順利事成，很可能關鍵性地影響近史後的後續發展。可惜整個推動

¹⁰⁶ 《郭廷以日記》1966/10/29，頁685；1965/11/07-08，頁686-687。

¹⁰⁷ 《郭廷以日記》1966/11/18，頁689 郭收到李來信，「渠云返臺有生命安全問題，誠不知所云。另函文孫，託代勸」。

¹⁰⁸ 《郭廷以日記》1966/12/01，頁691-692；1966/12/05，頁692。

¹⁰⁹ 《郭廷以日記》1966/12/12，頁693-694；1966/12/15，頁694 郭記下感慨云，「甚望在短期間能有適當之人，接替余之職務，趁此機會作一交待」；1966/12/19，頁695；1966/12/26&28，頁697；1967/01/04，頁700 記「李國祁來信，已決定不再回臺」；1967/01/11-12，頁701；1967/02/02-03，頁706-707；1967/02/23，頁711；1967/03/23，頁717；1967/04/10，頁721；1967/06/22，頁738；1967/07/21，頁743。

¹¹⁰ 郭有50封致張朋園書信，其中自第17封以後即多念及李國祁等門生、舊屬。收錄在陸寶千主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140-192。

過程，由於當時學術與政治生態複雜多變，遭遇重重險阻與挑戰，致成效不彰，或被迫中止，最終導致郭廷以憂憤辭職，屈身美國抑鬱而終。

郭對近史所的奠基之功，一如傅斯年之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辭世後，門生故舊們對其境遇深以為憾，紛紛從不同角度記述他們所知的片段，見證威權體制下臺灣早期學術領導者的處世、人際和應變的辛酸。唯獨未見劉子健留下這段回憶往事，以致除了張朋園的專書略提及劉的角色與貢獻外，此事鮮為學界所知。幸好，郭廷以在日記裡記下自己親歷的事務及過程，對劉子健參與並協助他推動的具體事務，都詳加記錄，讓後人可以看見劉子健以其識見、才學及優秀的語文能力，在美國學者及中研院高層之間發揮他溝通協調的長才，化解諸多誤會，尤其劉能堅持主體立場、處事準則，他對郭廷以提升近史所學術地位的支持與付出，有清楚的認識及掌握。¹¹¹

受到 1960 年代學術政治生態糾葛的特殊背景下，影響世事成敗的因素十分複雜，實不宜以成敗論得失。劉子健協助郭廷以充實近史所研究資源及研究能量所做的努力，竭心勞力的奉獻，還有他催生史丹福語文研習所、宋史座談會，彰顯他的眼界和處世為人，值得後人敬佩及感念。如果有人想用白居易的「病人之病，憂人之憂」¹¹² 這句話，來形容劉子健當時那顆熱血之心，大概亦不為過吧！

¹¹¹ 余英時先生讀完張書後表示，「郭、費、韋三位都能超出個人、團體、以至國家的利益之外，而承認史學研究自有其客觀公認的學術標準。所以儘管他們三個人各有政治立場或主張，他們卻誰也沒有以個人的政治取向來妨礙史學研究的自由發展。這三人之中，費正清先生自然是最引起爭議的一位。然而事實具在，費正清並沒有利用這個合作來實現任何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沒有企圖將他所認可的研究模式推廣到臺灣，使近代史研究所成為美國的史學殖民地。……量宇先生創辦近代史研究所自始便以『學』為中心，他既無意要弟子們發揮他個人所持的史學觀點和路向，更無意使他個人的政治取向介入研究所之中。在五十年代的臺灣而具此開放和超越的精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見余英時，〈序〉，收入張書，頁 iv-v。劉子健擔任郭、費、韋三人之間的溝通橋樑，亦然。

¹¹² 白居易，《策林一·興五福銷六極》，收入《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六七〇，頁 6820。